

日據時期台灣意識探析

黃繼朝*

近 20 年來“台獨”理論在台灣島內一直大行其道，不得消停，而作為“台獨”理論所標榜的所謂“台灣意識”，也逐漸為一些台灣人所接受和認可，那麼真正的台灣意識究竟從何而來？其內涵又是甚麼？實有必要對其進行釐清鑒別，以防有不正思想之人歪曲利用，藉以煽動民粹主義，以實現其政治利益。

台灣意識萌芽於 19 世紀末期的台灣民主國運動，興起於 20 世紀 20 年代的台灣民族運動。在整個日據時期，台灣意識是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堅決意志體現，是台灣人民反殖民運動的精神動力和思想指南，貫穿於整個台灣的反日鬥爭運動中。本文試從台灣早期武裝抗日運動及台灣民族運動切入，意欲闡明台灣意識的淵源及其真正內涵，從而進一步分析台灣意識背後的民族意識所在，證實“台獨”人士所強調的“台灣意識”與近代產生的台灣意識實有本質區別，批判近年來不可一世的“台獨”理論。

一、台灣早期武裝抗日運動背後的台灣意識

1894 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腐敗無能的清政府被迫割讓台灣。1895 年 4 月《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開始出兵全面佔領台灣，卻不想遭遇了台灣人民頑強不屈的抵抗。在台灣人民秉承家國大義誓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之際，懦弱的清政府不僅完全視而不見，甚至還嚴令台灣人民不得抵抗，以免受到牽連，此舉實深切刺痛台灣同胞的愛國之心。面對當時祖國遺棄，外敵入侵，“無天可籲，無人可援”的緊急局面下，台灣官民在不得已的情境下，惟有暫時抱以自主、自立的姿態堅決抵禦外侵，遂決定成立“台灣民主國”以作緩兵之計。成立“台灣民主國”前後，在台灣人民萬眾一心，死守家園的過程中，台灣

意識逐漸在台灣人心中萌芽，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產生一種“感覺到自己是台灣人的意識”¹。此種意識最早只是一種地方群體意識，由於台灣長期是一個移民社會，這種感覺其實之前並不明顯，在外部強烈的壓力下，此種以“台灣”為認同對象的群體意識開始覺醒。又因為台灣的主要群體都屬於大漢族中的閩南族群，故台灣意識自誕生起便帶有強烈的漢民族氣息，烙下了深刻的中華文化的印記。後來，在以“台灣民主國”為開端的早期武裝抗日運動的培育下，此種台灣意識逐漸充實起來，其具有反殖民性質的近代中華民族意識色彩亦慢慢走向鮮明化。

“台灣民主國”運動可以看成為台灣意識萌芽的始端，然而，對“台灣民主國”稍作分析，不難發現萌芽的台灣意識帶有強烈的祖國情節。在成立“台灣民主國”的過程中，雖然清政府的所作所為令親痛仇快，但台灣官民仍然展現出深厚的民族忠義氣節。在 1895 年 5 月 25 日“台灣民主國”發表的《致中外文告》中便聲稱：“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台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辦理……如各國仗義公斷，能以台灣歸還中國，台民亦願以台灣所有利益報之”。² 其中就明確說明了“民主國”成立實屬無奈之緩兵之計，一為組織軍民堅守家園，二為不牽連已簽約之中央政府，同時亦希望博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尋求西方列強幫助。而一旦事情解決後，“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辦理”，其最終目的乃是為“能以台灣歸還中國”。

“台灣民主國”從表面上看是“自立為國”，而實際上當時“民主國”發佈的各類文告、通電，都不曾用“獨立”，而只是用“自主”、“自立”來申明立國抗日的目的。³ 唐景嵩以總統名義發出的文告中稱：“惟是台灣疆土，荷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雖自立為國，感念列聖舊恩，仍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

*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相通，無異中土。”⁴ 劉永福在台南發佈的與台民“盟約書”中更明確表示：“變出非常，改省為國，民為自主，永隸清朝……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內事也，萬死不辭”。⁵ 台灣紳民在發給清廷的電報中沉痛表明：“台灣紳民，義不臣倭，願為島國，永戴聖清”。⁶ 此外，“民主國”所用國旗、國號亦鮮明地表示出對清朝臣服，對祖國歸屬。對於“民主國”創建人來說，家國的忠義早已在心中根深蒂固，為了守護家國領土，他們帶領台灣人民奮不顧身地抵禦日本侵略者，在中華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史上寫下了重要一筆。

“台灣民主國”運動是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侵略的開端，被稱為“乙未之役”，雖然最後失敗，但促進了台灣人群體意識即台灣意識的覺醒，推動了後來前赴後繼的武裝抗日運動。在其之後，自 1895 年到 1915 年 20 年間，台灣人民在家國情感以及民族主義的支柱下，在台灣意識的凝聚下，發動了上百次的武裝起義來反抗日本侵略。在整個武裝抗日運動期間，各地抗日軍民所標榜的價值觀無一不包括驅日復清、保家衛國等含義，收復台灣，回歸祖國乃是各地抗日軍民的共同心聲。在北部，胡嘉猷等人在檄文中公開宣佈：“此次征倭，上報國家，下救生民。”他們使用清廷“賞戴藍翎”頭銜和光緒年號，以恢復中國對台灣的主權為訴求。參加反攻台北的義軍首領胡阿錦在起義文告中仍然沿用光緒年號，以示不忘中華祖國。中部義軍首領柯鐵、簡義共聚大坪頂，號稱鐵國山。他們在大坪頂上樹起“奉清征倭”的大旗，並以“奉天征倭鎮守鐵國山總統各路義勇軍”的名義發表文告，號召台民武裝抗日“克復台灣”。⁷ 同時，各次起義還得到了祖國大陸人民的支持，如台北大起義就有來自廈門的有生力量加盟其中。而福建閩南一帶因與台灣毗鄰也成為了起義軍的重要後勤基地。辛亥革命爆發後，島內的民族運動更是深受鼓舞，與大陸交相呼應，同盟會成員羅福星返回台灣以“驅逐日人，光復台灣”為號召發動起義。被捕後，羅福星大義凜然地正告日本殖民者：“汝等日本政府慘殺我同胞，雖我福建政府直接干涉，亦無效果。我華民此次欲殺汝等日人。為我漢民族報仇雪恨也。”⁸ 最後審判時他宣稱為台灣同胞爭取自由權利而死，雖死猶榮，從不後悔。以上這些都反映了台灣各地抗日隊伍中強烈的祖國情懷和民族情感。早期的台灣武裝抗日期間，在官民心中，雖然自我認同的台灣人意識逐漸開始萌芽成長，但對於中國及中華民族的近代民族主義情感才是台灣人群體意識背後最主要的精神支持。

二、從台灣民族運動的政治面向看台灣意識

1915 年，隨着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起義的最後失敗，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鎮壓以及其殖民政策的轉變，為了避免無謂的過度犧牲，台灣的一些開明紳士及先進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開始尋求一條溫和而非暴力的“合法”抗爭道路。至此，台灣早期的武裝反日鬥爭逐漸告一段落，台灣民族運動開始興起，台灣意識逐漸成長起來。20 世紀 20 年代，在一批留學國外或大陸的社會精英的主要領導下，同時受大陸五四運動的影響，台灣社會亦興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旨在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實現民族獨立自決。這場運動總的來看主要有兩個面向，於政治方面主要通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來爭取民族獨立自決之權利，文化方面則通過成立文化協會，宣揚白話文，傳習中華文化等來開展文化啟蒙運動，加強中華文化與民族意識，抵制日本同化教育。應當看到，在整個台灣民族運動發展的過程中，台灣意識亦不斷得到強化和鞏固，其根本原因便在於當時台灣意識的主體便是一種民族意識。台灣民族運動本質上是屬於中華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運動的一個分支，那麼在台灣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自決的運動中，體現為台灣意識的民族意識的覺醒和壯大就再正常不過。

仔細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進行分析，可以看到台灣民族運動與近代中國的民族運動是密不可分的，其所醞釀發酵的台灣意識其內涵實乃是一種鮮明的民族意識。“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動於 1920 年，至 1934 年止，共持續 14 年，是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久、影響最深遠的一場政治社會運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一批台灣有志之士為抵制日本殖民同化政策，爭取民族獨立自決，而向日本帝國議會先後發起的 15 次請願運動，其具體目標在於堅決反對台灣總督的獨裁權力，要求設立台灣民選議會，擴大台灣人民的參政立法權。儘管這場運動最後以失敗告終，但卻反映了台灣民眾積極爭取民族獨立的反日民族運動的堅定決心和堅強信念，凸顯出一股強烈的台灣意識。在“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影響下，一時間由台灣意識所衍生的爭取“台灣獨立”，實現“台灣自治”的理念亦開始盛行，但要特別釐清的是，當時追求的“台灣獨立”與現今“台獨”分子所叫囂的“台獨”有着本質的不同。其一，當時所爭取“台灣獨立”的反抗鬥爭乃是為了反抗日本殖民的殘暴統治，根本目的是為了使台

灣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復歸中國。此舉與中國內地其他地方如東北的抗日鬥爭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都屬於中華民族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運動的一部分。其二，當時民族運動志士俱深受中華文化影響，具有深厚的中華民族意識，強烈認同中國。台灣民族運動的三大領袖同時第三次“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領導者蔣渭水便是其中的典型人物。蔣渭水自小便接受中華傳統文化教育啟蒙，埋下愛國民族意識的種子，後加入同盟會，信仰孫中山新三民主義，成為一名堅定的民族主義志士，終其一生都為台灣人民的抗日民族鬥爭而奮鬥，甚至於還被台灣警署惡稱為“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另外，如林獻堂、蔡惠如等人都胸懷濃厚的中國情結，雖然他們所作出努力各有不同，但不論如何都始終是以台灣人民為重，以台灣復歸祖國為最終目標。林獻堂作為“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相始終的重要領導人，一直提倡漢文化，終生不講日語，不讀日文，其思想雖偏於溫和保守，但終其一生始終以“徐徐以謀恢復”⁹為念，為爭取民族自治權利，開展民族運動而努力。

另外，“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除了請求設置台灣人議會，力爭台民自治權利之外，在抵制日本同化政策，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方面亦做出了一定努力。對於總督府強制推行的日語教育以及“渡華旅券制”（對於大陸人民到台灣，早自 1895 年即發佈過特別限制上陸條例，普通勞工入台，更要求攜帶渡海證明書，在規定的地點上陸，等等¹⁰）等同化政策，請願運動表達了強烈的反對與抨擊的聲音。1929 年，第 10 次請願前夕，請願代表王受祿在演說中明確宣佈：“我們台灣人係有數千年歷史的漢民族，且有輝煌的文化，……然而台灣總督府對具有高度文化的我們民族，妄想使其同化於大和民族，這恰如水與油，絕對不可能之事。……壓迫愈強，我們的抵抗愈烈，惟有達成最後目的而已。”據當時相關資料記載，時總督府警察總局對請願運動亦表示深切擔憂，認為雖然請願運動的領導幹部均較為溫和穩健，似無追求“台灣獨立”及復歸中國之意，但請願活動卻多以中國觀念或漢文化為中心，而運動在台民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台灣人民“均視此一運動為民族運動”，“對此贊同者大多受民族自決思想所惑，至少希望台灣之自治，進而希望獨立或期望復歸中國”。¹¹

固然，在長達 14 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在努力爭取民族自治權利的過程中，台灣意識逐漸被強化和放大，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開始增強“自身是台灣人”這種意識，然而，此種群體意識與現今

“台獨”理念截然不同。在請願運動影響下成長的台灣意識，其一是為了凝聚團結台灣人民，爭取殖民地人民的自治權利；其二是為了抵制日本同化政策，反抗日本意識的侵蝕。從根本上來看，此種台灣意識的真正內涵帶有濃厚的民族與同胞情義。正如當時新竹中學一學生被搜出的傳單所言：“目睹我同胞被虐待與我祖國現狀，希望台灣早日出現多數偉大的人物來為同胞報仇，台灣的青年男女奮起啊！使台灣像十五夜無有半點浮雲，光輝照耀世界，快起來追擊我們的仇人！同胞啊！”¹²

三、從台灣民族運動的文化面向看台灣意識

20 世紀 20 年代，在武裝抗日鬥爭連續受到殘酷鎮壓的嚴峻形勢下，隨着日本開始在島內大肆推行文化同化政策，台灣一大批有志之士開始逐漸轉變鬥爭思路，重視文化抗日，意圖通過大力宣揚台灣文化來抵制殖民同化，於是在島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化啟蒙運動，而這場文化啟蒙運動也成為台灣民族運動的主要組成部分。1920 年 7 月 26 日，留日台生進步團體“新民會”在東京創刊發行《台灣青年》，仿效陳獨秀所辦《新青年》雜誌，宣揚民主自由思想，由此掀開台灣文化啟蒙運動的序幕。1921 年 10 月 17 日，台灣進步知識分子及開明紳士蔣渭水、林獻堂等人在台北成立“台灣文化協會”，以“謀台灣文化之向上”為宗旨，意在通過提高文化、啟發民智來喚醒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進而擺脫日本殖民同化主義思想的束縛。協會成立後，通過發行會報、文化叢書，出版刊物，設讀書報所，辦學術講座等舉措，努力宣揚先進文化，開展反日民族思想教育，成為台灣文化啟蒙運動中的主要團體。“台灣文化協會”明確指出以台灣文化為上，始終以確立與傳揚台灣文化為重要使命，凸顯了當時台灣意識的逐漸成熟與發展，但只要簡單分析當時台灣文化產生的背景環境，就可發現台灣文化及其背後之台灣意識的凸顯強調乃是因應抵制日本文化同化政策的需要而產生，是台灣同胞文化抗日的重要體現，其本質乃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是中華民族抗日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進一步而言，對台灣文化進行剖析，亦可看出其實質內容與中國文化的密切關聯，凸顯其文化民族主義的特質。

“台灣文化協會”所倡導的台灣文化主要包含兩方面，一方面是宣揚近代西方民主、自由為核心的啟蒙思想。其倡導者通過辦報、演講、演劇、下鄉等

多種活動形式，向台灣地區引進介紹了各種世界上的新思潮，諸如民族主義、個人主義、社會主義自由、民主、平等、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等等。在引進西方啟蒙思想上，“文化協會”深受大陸近代“新文化運動”之影響，其所創立的《台灣青年》刊物便是仿效北京《新青年》雜誌，“文化協會”所推崇的民主、自由、科學的價值，亦是大陸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精神旗幟，故台灣文化啟蒙運動又被稱為“台灣新文化運動”。另外，與大陸“新文化運動”一樣，“台灣新文化運動”在引進西方新思潮的同時，對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也進行了反思和批判，但值得強調的是，不同於大陸“新文化運動”的全面否定，“台灣新文化運動”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始終抱着積極開明的態度，一直堅持吸收西方先進思想與宏揚民族文化精粹相結合。身處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尤其是面臨外族文化的同化教育，台灣人民更能體會民族文化的難能可貴，正如大陸學者黃平所分析，“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壓制，除了需要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中進步的成分以外，還必須啟發、振興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思想，才能夠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尤其是文化的統治和同化的圖謀。”¹³ 因此，另一方面，“台灣文化協會”在引進西方新思潮的同時，亦致力於宣揚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文化協會”積極在島內推動漢文振興運動及白話文運動，舉辦漢文講習所，努力推薦學堂使用當時流行於祖國的簡易尺牘文、小學國文課本等等，並在台灣許多地方設立“北京語講習會”、“漢文研究會”。此外，“文化協會”還通過開辦各類文化學術講座，進行弘揚民族意識，牢記中華文化，不忘中華祖國的各種講授活動。

在“台灣文化協會”的啟蒙和教育下，隨着台灣意識的昇華，20世紀20年代在島內及大陸各地陸續成立了一批由台灣青年組織的旨在追求台灣獨立自治的進步團體，如台灣“興華協會”、上海台灣自治協會、廈門中國台灣同志會等等，這些社團組織雖然多標榜追求“台灣獨立”及“台灣自治”等內容，但其本質卻都是為了使台灣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復歸中國。例如，台灣“興華協會”便多次組織學生進行罷課鬥爭、抗暴鬥爭來抵制日本殘暴殖民統治。1924

年6月25日，設在上海的台灣自治協會發表敬告中國青年學生書，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偽善面具，號召中國青年學生以實力開展愛國運動，“同時來幫忙我等亡國台灣同胞之自由獨立運動”。1926年南京中台同志會成立宣言明確闡明：“考之歷史上之事實，台灣滅亡之日，亦即是中華民族被帝國主義控制之時，中國完全屈服于日本之時，即為台灣民眾被日本帝國主義壓榨之時，故中台兩地民眾實有共生共死的密切聯繫。”¹⁴ 應當說這些愛國進步團體之湧現正是台灣人民恪守祖國意識，煥發民族精神所致。

四、結語

在日本殖民統治的50年中，台灣人民始終不畏強暴，不甘屈服，一直通過暴力或非暴力鬥爭的各種方式頑強地堅持反殖民運動，積極爭取民族獨立自主。應該看到，在這一艱難的奮鬥歷程中，隱匿於台灣人這個族群下的地方群體意識即台灣意識開始凸顯、強化，並無可替代地在台灣人民反日殖民鬥爭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是凝聚台灣人民團結起來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思想磁石，另一方面，它是台灣人民抵制日本文化殖民主義的重要武器。然而，需要特別認清的是，當時的台灣意識與現在“台獨”理論家所強調的“台灣意識”有着本質上的不同。按照台灣學者施正鋒的觀點，台灣意識是一種以“台灣”為認同對象的群體意識。此種台灣意識並非無根之木，無絮之萍，由於台灣的主體族群為閩粵移民，主體文化為閩南文化，所以台灣意識完全是以漢文化和漢民族為根據而衍生而來。另外，在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鬥爭的過程中逐漸成長起來的台灣意識，無論從早期的武裝抗日鬥爭還是後來的台灣民族運動來看，其背後都帶有濃郁的祖國意識和中華情節，其主體實際上是一種民族意識，其出現的需要乃是為了抵制日本的民族同化政策，其產生的使命乃是為了抵禦日本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侵略，屬於近代中華民族主義在台灣覺醒的表現。

註釋：

- ¹ 沈惠平：《當代“台灣民族主義”淺析》，載於《貴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5期，第8期。
- ² 陳碧笙：《台灣地方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218頁。
- ³ 才家瑞：《日據時期(1895-1945)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認同》，載於《天津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第295頁。
- ⁴ 同註2。
- ⁵ 戚其章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51頁。
- ⁶ 《自稱島國》，載於《申報》，1895年6月3日。
- ⁷ 《台灣憲兵隊史》，龍溪書舍復刻本，第200頁。
- ⁸ 同註2，第221頁。
- ⁹ 1907年，林獻堂在日本奈良遇到正在亡命之中的梁啟超，向他請教救亡之法。梁曰：“祖國在30年內絕無能力幫助你們，武裝反抗只有徒增犧牲，最好效法愛爾蘭人抗英故智，廣泛結納日本中央有力人物，使之牽制總督府行動，籍以減輕台灣人民苦痛，徐徐以謀恢復”。林氏深以為然，並服膺終生。梁言引自《林獻堂先生年譜》。見《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一)，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第30頁。
- ¹⁰ 吳文星：《日據時期在台華僑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91，第144-150頁。
- ¹¹ 轉引吳三連、蔡培火等：《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71年，第147頁。
- ¹²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編：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台北：台灣歷史博物館，2008年。
- ¹³ 黃平：《飄零與孤懸中的掙扎——日據時期台灣地區對祖國文化的堅持》，載於《東南學術》，2004年第4期，第140頁。
- ¹⁴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志卷九革命志·抗日篇》，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年，第239頁。